

V. 1989年经济理论

研究概况

1989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若干问题研究概况

1989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时期的第一年。在这一年中,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冷静地思考过去,冷静地思考未来”的精神,在对建国40年来经济发展和1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继续就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国有企业改革、价格体制改革、通货膨胀的成因和治理,以及农业经济的发展与改革等现实性极强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一些进展。现将讨论中出现的各种观点概略介绍如下:

宏观经济调控理论

1989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由上半年的供给不足、市场紧俏,忽而转为下半年的市场疲软、销售不畅,实践对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一、如何看待1989年的宏观经济形势

这是宏观调控理论讨论的基点,对形势判断的不同,直接影响着对宏观经济调控理论问题的看法差异。

1. 许多人持乐观论,认为虽经1988年的严厉紧缩,但消费膨胀和投资膨胀的势头仍然很盛,物价上涨率仍然较高,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超过7%,属于高速增长。因而1989年继续紧缩的方针不能动摇,以防再出现那种“软着陆”尚未实施,货币发行、经济增长再度“腾飞”的现象。持有这样观点的人认为,从我国经济波动的历史经验看,每一次“大落”都是“大起”的结果,周期中低谷下沉的程度总是与高峰扩张的程度相对应。从这次紧缩的要求看,前期延续四五年的超高速增长带来的比例失调,没有一二年的调整是难以恢复协调的。现在的增长速度比前两年近20%的超高速增长降低了10个百分点,并没有越出调整的常轨,不必大惊小怪。虽然速度下降和通货膨胀并存,但我国经济并未陷入滞胀困境。

2. 也有很多人则与此相反,持悲观论。他们把眼光更多地瞄准于市场,而不是增长速度。认为经过“急刹车”以后,使得并没有陷入严重膨胀境地的我国经济,开始转入市场需求普遍疲软的情势,而市场疲软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自然跌落、生产能力闲置、开工不足的必然先兆;而且现实经济运行中“萎缩”和“衰退”也正在累积,问题的症结必将由供给不足转向需求不旺。从紧缩的效果来看,蒙受紧缩之苦的首当其冲是企业,紧缩使企业资金周转不动,企业间的债务链无法清偿,从而整个经济运行陷入停滞状态;与此同时,由于价格刚性的作用和国家统一价格的约束,紧缩一旦为期较长,其效果就转向几乎单纯性地抑制

生产，而不是抑制物价。因而最终等待我们的必将是滞胀的深渊。因此，他们认为应该适当放松控制，逐步结束全面紧缩的格局。

二、如何完善宏观调控机制

1. 一种观点认为，1989年经济形势戏剧性变化的原因，就在于宏观调控机制不完善。而宏观调控方式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是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现阶段我国间接调控机制尚未发育起来，还不能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的速度和经济结构的重组，这时如果单纯取消直接控制，势必将造成经济失控和紊乱，而一旦出了问题，又必然重操旧器，直接调控机制再度被启用。所以，我国经济要摆脱这种大起大落的循环，在宏观调控机制上就必须采取“蜕皮”的方式，逐步完成直接调控机制向间接调控机制的转变。所遵循的重要原则是，破之前要创造立的条件，而在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时候，破就没有意义，即使破了，也必将再被立起来。

2. 另一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机制作用的总目标应该是“在保证经济体制顺利转换的同时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要实现这样的目标，直接控制的实施应该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这要以维护市场的合理性和克服市场的缺陷与不足为前提。具体说来，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要实现四个“脱钩”：一是国家计划要与分投资、分物资脱钩。国家计划的重点是管规划，包括发展战略、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重大比例关系、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生产力布局等。二是投资要与财政收支脱钩。让投资通过建立基金平衡制，取得稳定的、合理的资金来源。三是财政要与银行脱钩。财政出现赤字，用发行债券来解决。四是银行信贷发放与货币发行要脱钩。在保证信贷总规模不突破的前提下，调整贷款结构，结合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进行投放，不能让信贷出现差额时通过货币发行来弥补。

3. 关于直接调控机制与间接调控机制合理配组问题，有人提出了分层次进行宏观调控的设想，即把宏观调控分为中央主体层、地方中间层和区域协调层。中央主体层除了直接对有关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外，还通过从全国宏观经济的全局出发，安排各区域的经济布局、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等，来实现对地方和区域层次的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地方中间层则根据国家间接调控的要求，结合本地的实际，具体组织本地的经济运行。区域层是指商品经济运行的经济区，它着重于从横向经济联系、区域经济合理的角度出发，实施对按行政区划定的地方中间层所不能做到的经济运行的协调。这种分层进行宏观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被认为有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有控制、有管理的市场体系，有助于实现经济体制的顺利转轨，可视为较好的过渡模式。

4. 有人认为，实现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转换的矛盾焦点在于市场。旧体制排斥市场，新体制的运转要以市场为核心，实现调控模式的顺利转换，关键在于体制中市场这个新生儿如何发育起来，并处理好它与计划、与企业行为的关系。而目前的情况是，市场发育很不均衡——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并拖了其它市场发育的“后腿”。市场发育的这种不均衡状态，使得新旧体制的摩擦在价格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一旦摩擦加剧，便引起体制摩擦性通货膨胀。与市场发育不均衡相伴随的是，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市场与企业的关系难以处置。作为国家调控部门，尚不适应甚至不熟悉以市场为中心的体制的运转规则，不具有这种调控能力，调控手段也不完善，反而对旧的行政调控驾轻就熟；同时，市场发育也很不均衡，而且在地区间分块、割据严重，没有一个可以有效地进行调控的市场，因而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断裂带一时还难以弥合。在市场与企业之间，不仅市场不能有效地发挥对企业的调控效力，而且企业尚未成为市场主体，对市场的反应还不灵敏。企业成为市场主体，这有赖于企业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而企业体制的改革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仅需要一个过程，甚至会出现反复，走回头路。在实现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转换过程中，如何处理市场与计划、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将成为宏观调控模式转换、甚至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核心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全部问题，是理论界应该继续关注并解决的主要问题。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

主要讨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改革要不要以市场为取向

1. 持否定意见的同志认为,市场取向的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改革绝不能以此为终极目标。经过几十年正反、反正的实践,最终历史做出了结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只能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存在市场,但不存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宏观分配短缺资源以取得经济效益、确定发展的优先顺序以求得整体利益,都要求有统一的社会权威。因此,必须也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迷信市场经济。在中国市场先天发育不良的情况下,更不能以市场为改革的取向。有人认为,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歪曲并等同于私有制基础上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从而主张全盘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的观点,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表现。有人认为,前一时期由于改革的取向有问题,出现削弱计划经济和计划调节的倾向,这正是近期突出表现出来的总量失控、经济秩序混乱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目前在治理整顿过程中,十分有必要强调计划经济,包括采取某些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措施。

2. 持肯定意见的同志认为,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市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通过市场来实现,通过市场来运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宏观间接控制下的市场调节模式转换。市场是联接微观主体和宏观主体的枢纽,因此,可以说,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或称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制度。所谓改革以市场为取向,就是要把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作为改革对象,在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上寻求最佳模式,把计划建立在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宏观计划控制下的市场协调经济模式,而决不是搞全面市场化,其目的正是要培育发达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增强社会主义经济活力。有人也指出,总量失控、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物价大幅度上涨等等经济现象的出现,与其说是市场造成的,不如说是计划失误、不恰当的行政干预造成的,正反映出以市场作为取向的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有人还指出,在我国一些地方、部门的实际工作中,既不是有计划按比例办事,也不是按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而是“按关系办事”、“按私人感情办事”、“按小团体、地区、部门的私利办事”,这些只有通过建立正常的市场运行规则才能最终得到解决。

二、计划和市场的结合问题

1989年,在回顾和反思改革10年来计划与市场关系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对曾经在经济理论界提出的“板块论”、“渗透论”、“胶体论”、“形式内容论”、“有机联系论”、“二次调节论”、“笼鸟论”、“风舵论”、“针摆论”等作了进一步的讨论,认为关键在于寻找出计划和市场如何结合及其最优结合点,从而又提出一些较有新意的不同观点。

1. 重合论。有人认为,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范畴,应该明确认识到,计划经济不一定注定就是僵化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也不一定注定就是自发的。既然它们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理所当然地必然有其共通共融之处,因而按照它们各自的内在要求,可以使它们统一成为一体。这种“合二而一”,就是“重合论”。计划和市场的重合,正是客观见之于主观和主观作用于客观的合理行为。为了说明“重合论”,有人还提出了“有计划的价值规律”和“有计划的市场”等新概念。

2. 自由必然论。有人认为计划与市场是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即此岸与彼岸的关系。科学的计划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是对必然的认识,是“自由王国”。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首先要充分认识市场,真正按市场规律办事,才能获得人们行动的自由。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市场机制好比商品经济的自动装置,而计划则是模拟市场而对未来进行纵向的全局性的宏观调控装置。因此,计划和市场并非互相排斥、非此即彼的,而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着力并推动社会主义经济机体的有序发展和运转。

3. 合力论。一些同志不同意上述两种观点,认为计划和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调节者,由于它们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作用,因而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讲,只能是“合力”的关系,而不能是“合一”的关系,也不是什么“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有人认为,市场渗透了计划性,制约着市场规律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冲动性;而计划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是否能摆脱“长官意志”。

4. 主辅论。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调节体系中,只能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种主辅关系首先指的是总量平衡要统一计划,关键产业、重要产品要统一计划;其次,计划与市场相矛盾时,市场要服

从计划。有人认为,市场和市场规律中主要就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只不过是计划可以利用的一种工具,是为计划服务的,而不能“喧宾夺主”。

5. 时空论。有的同志虽然赞成计划和市场有主有辅的观点,但是又认为这种主辅关系并不象持“主辅论”观点的同志所认为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的,而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的。从时间上看,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当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大致平衡时,应以市场调节为主,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当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不平衡时,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平衡时,应以计划为主,重视计划机制特别是指令性计划机制的作用。从空间上看,在同一时间内,如为了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和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对能源、原材料的需要,要求针对不同物资及不同的供求状况,区别对待,采用不同的调节手段。关于如何确定这种随时空变化的主辅关系,有人提出主辅关系定位标志为:(1)是否有利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2)是否有利于增强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生机和活力;(3)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高效地发展。

6. 主导基础论。认为应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计划调节为主导,就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宏观经济运行来看,它是受国家计划调节的;就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的企业行为而言,它是受市场调节的,所以二者是不同层次的调节手段和方式。“计划调节为主导,市场调节为基础”这种提法,体现了二者的有机结合,它既不同于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主辅论”,也不同于市场调节是基础性调节,计划调节是协调性调节的“二次调节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在时点序列上没有先后主次之分。有人则认为,以提“国家调节为主导”更好,因为国家调节不仅包括计划调节,而且也包括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及其他方式进行调节。

有人不同意这种提法,认为过分强调计划调节为主导,会造成为计划而生产,以致重走过去所走的已被实践证明走不通的道路。市场调节意味着经济运行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市场,计划调节也要通过市场去实现,因此,如果提市场调节为基础,就不一定要提计划调节为主导。

7. 区分层次论。认为从理论上讲,计划和市场都要区分为制度层次和运行层次。制度层次要强调计划经济是特征;而在运行层次上,两者都是有效配置资源的手段,没有主次之分,而是缺一不可。从实践上看,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或者以计划调节为主,或者以市场调节为主。持这种观点的人中,有的还运用经济控制论的方法,将计划调节作为前馈调节,即在经济系统的行为发生偏差之前,根据预测采取措施,将经济系统的行为依据经济系统的目标纳入一定的轨道;市场调节则是反馈调节,即根据市场反馈的信息对经济系统的行为进行调节和控制。两种调节方式共同作用,才能使经济系统保持良性运行。

8. 内在统一论。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个统一体,有计划的市场调节就是其特有的调节手段,而不存在什么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有计划的市场调节,说明计划与市场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对方单独起作用。计划是建立在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基础上,是依存于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的计划;市场是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计划和市场在相互依存中覆盖全社会、调节整个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计划调节受市场制约,市场调节受计划导向。计划和市场由于内在的统一而各自改变对方的形态,计划由于引进市场机制并借助于市场机制进行计划调节,实际上变成有计划的市场调节;市场由于接受计划指导,按计划目标要求来调节经济运行,实际成了包含市场机制的计划手段,纳入了计划调节轨道。

三、关于“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模式

1. 认为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来看,这一模式是可行的。这是以企业为本位,实行国家——市场——企业双向调节的新的计划调节的商品经济运行机制,既体现了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要求。这一模式的内容和要求是由市场机制直接调节供求结构、调节企业投资规模和经费需求规模;国家借助产业、财政、货币、收入等政策及相应的经济参数分别调节上述市场调节过程,以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宏观总量平衡目标。当然,这一模式也并不排除国家通过行政、立法等方式对企业进行直接干预。

2. 认为这一模式只是一种目标模式,实现它需要具备三个必备的条件:(1)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具有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成为市场的主体;(2)市场体系完善,市场组织制度健全,市场有相当高度的发展;(3)国家具有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与手段。而我国现阶段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难以实现。

3. 认为这一模式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两头都是市场,而计划根本没有了。所以,这种模式的提出,为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开了“绿灯”,而市场化的逻辑发展必然是私有化。因此,这种模式在我国是行不通的。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1989年的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二方面的问题。

一、对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形式的不同评价

迄今正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实行的改革形式主要有承包制、股份制、资产经营责任制和租赁制等。其中承包制和股份制的影响最大,理论界对它们的评价仍然有很大的分歧。这里仅就前三种改革形式的讨论作一介绍。

1. 承包制。讨论中大致有三种观点。

(1) 一种观点认为,承包制是两权分离的较好形式,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是暂时的,可以在实践中解决,并使承包制不断完善和发展。持这一观点的同志认为,承包制既使企业有了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又承担了对国家和全民的责任;既保持了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必要的管理权,又保障了企业的经营权,排除了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从而建立了使企业行为合理化的企业经营机制。还有人认为,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方向不能是私有化,股份化也只能是试点,因而相当长时期内比较可行的就是实行承包制。

(2) 另一种观点认为,承包制并非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而只是双重体制阶段所采取的一种过渡性的企业经营方式。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承包制完善的方向只能是现代股份制。也有人认为,承包制的推行将形成财产所有权的多元化,从而为实行股份制提供前提条件,因而承包制是走向股份制的必要准备。

(3) 再一种观点虽较接近于第二种观点,但评论的角度则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比较注意实证分析,从而对承包制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特征有较多的把握。比如,有人通过对承包制企业的调查后提出,国有制改革实践从承包制起步有其客观性,但传统体制下所有者虚置导致的国有企业行为约束软化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变,并且又增添了新的因素,使承包制改革本身面临着一系列的两难选择。还有人在调查报告中谈到,承包制的许多问题是由承包制本身的制度性缺陷产生的,不可能在承包制自身的完善中根本解决,而必须创造新的制度形式来解决。

2. 股份制。大致也可分为三种观点。

(1) 一种观点认为,股份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好形式,应该大力倡导。比如,有的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股份制是最适合于全民所有制采取的一种形式,这不仅因为它本身固有的“两权分离”特点使“政企分开”易于贯彻,还由于股份制经济在自己的发展中培育出了以资本市场为中心的一套经济机制,将其移植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中来,将会使全民所有制变得名副其实。

(2)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不应是股份制。如有人认为,股份制作为集资的一种形式,在某些新办企业、集体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可以试行,但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要十分慎重,目前只能试点。还有人认为,股份化中搞机构持股和个人持股,将导致新的政企不分和化公为私,因此不赞成推行股份制。

(3) 再一种观点认为,股份制是一种方向,但目前尚缺乏普遍推行的条件,应该努力创造条件。如有人认为,股份制在充分市场经济中的一些长处,在我国市场体系不完整、市场机制不健全、价格体系不合理条件下,未必能正常发挥。因此,创造条件是个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3. 资产经营责任制。大体有两种意见:

(1) 一种观点认为,资产经营责任制不过是承包制的一种类型,只有它比较注重在资产评估基础上的投标竞争,但在我国目前市场体系不健全、价格参数扭曲的情况下,竞争实际上很难展开,因此资产经营责任制难以克服承包制的弊病。

(2) 另一种观点认为,资产经营责任制优于承包制之处在于它试图规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使企

业之间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竞争,但也正因为如此,它难于照顾我国企业之间现有的实际不平等状况,从而不能象股份制那样推广开来。并且,它跟承包制一样,都不能使企业真正做到“自负盈亏”,因为这里的企业经营者只是作为受国家委托的经营者,既无力承担亏损,也没有理由要求他承担全部经营亏损。

二、对国有企业改革理论和实践的反思

1. 关于国有企业民营化问题。

(1)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应搞民营化或财产个人化。基本理由是:只有财产个人化才能明确界定产权,才能使企业具有强有力的动力机制;只有财产个人化,才会有真正的市场,才能有竞争的制约机制,从而才能有效地协调经济活动。如何实现这种个人化呢?有的主张按现有体制下的级别将国有企业财产以股份形式无偿分给广大职工和各级干部,有的则主张从个人储蓄入手,累积到一定数额后由银行贷款给个人购买。

(2) 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民营化”或“个人化”实际上就是私有化,这在我国是一个可怕的“陷阱”。主要理由是: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实行了私有财产制度,但并没有带来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幸福,我国正是在长期的私有制度下走投无路才选择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今天的发达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才出现的,曾有过残酷的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在我国目前公有制已经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再要私有化实际上是历史的倒退,后果之一是导致官僚资本主义化。

(3) 再一种观点认为,全盘私有化在我国确实行不通,但对某些企业也可以研究探讨其是否有可行性。因为,私有化计划同其他任何计划一样,其实施效果是有条件的;很明显,私有化并不能解决经济中的全部问题,而仅仅是从经济激励的角度改变企业无效率局面。因此,私有化运用于某些企业、行业也有可能产生一定的调节效果。所以,不能笼而统之地谈私有化行不行,而应进行过细的案例分析。

2. 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反思。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到1989年止,效果还是明显的,但同样明显的是,问题也已经相当多,如企业短期行为、激励作用递减、消费和投资双膨胀等,这迫使人们对这些年的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反思。

(1) 有人认为,我国迄今的国有企业改革存在着两个失衡:一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与市场制度建设失衡;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与激励制度建设失衡。前者的经济影响在于市场未能对放权后的企业行为发生有效的约束,后者具体表现为激励结构自身失衡,从而破坏了自主权发生作用的利益基础。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已经瓦解了体制的整体性,导致行政调节与市场调节两种机理完全不同的调节机制都无法发挥作用的局面。因此,进一步改革的任务是平衡发展,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体制的整体性。

(2) 有人则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正面临着严重挑战,急需寻找新的对策思路。他们认为,近年较为流行的关于硬化公有制内部财产关系的说法颇为流行,但如果离开了现有国有企业的分类,这种“硬化”将会显得很不合时宜。他们主张把国有企业分成两类,必须由政府严格控制的企业属于第一类,由市场支配的企业属于第二类。第一类如交通、邮电、钢铁、能源、新兴尖端产业等行业的国有企业,其职能实际上是国家职能在经济领域的延伸,由市场调节将产生不良后果。第二类则是竞争性行业的企业,以盈利为目标,由市场来调节,为此需彻底变革目前的管理体制。

关于价格体制改革

一、在经济环境不宽松的情况下,能否继续进行价格改革

价格体制改革是否需要宽松的经济环境,这是一个曾经激烈争论过的问题。面对1989年的经济环境变化,价格体制改革是否还应继续推进,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1. 一种意见认为,仍有进行价格改革的必要性。因为,微观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求价格体系合理化,没有合理的价格,企业体制的改革就难以推进。如果在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硬要搞企业体制的改革,其结果甚至会与我们进行体制改革的初衷南辕北辙,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愈加低下,资源配置的效率愈加恶化,市场体系无法形成,市场机制发育受阻;价格扭曲会导致不平等的经济调节规则,而在一个非常大的国家里,这种不平等的经济调节规则就需要分层次的行政部门来协调经济运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权力就不

得不分散给各级地方政府,结果使宏观经济控制能力变得十分软弱;由价格扭曲而造成的市场紊乱、流通无序还会继续成为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土壤,而这会反过来进一步加剧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应该在治理经济环境、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伺机进行价格改革。甚至有人认为,1989年下半年出现的市场、特别是消费者市场疲软,是为全面铺开价格体制改革,提供了最好的时机。1989年下半年铁路客运票价的大幅度调整,并没有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带来多大震动,就是最好的证明。

2.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经济波动较为严重、经济形势不稳的情况下,价格体制的改革应谨慎从事,否则会造成国民经济的更为严重的震荡。首先,我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和进一步加剧是与价格体制的改革有直接关系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二位数,再进行价格改革,放松价格管制,只能使通货膨胀率进一步加码。其次,改革价格,工资如不相应调整,就会受到人民群众承受能力的局限,如工资也相应调整,那会造成工资和物价的循环上升,加剧需求拉起的通货膨胀。再说,在市场疲软、销路不畅的情况下,价格改革也并不能起到有效地引导生产、调节经济的作用,因为产品销售困难,价格合理也不能保证生产有利可图。最后,进行价格改革往往需要财政拿钱,而去年国家财政收支状况明显不佳,收入增加不易,支出刚性难减,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支持价格改革的财力不足。

二、价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社会主义价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否就是市场价格,这种市场价格有没有自己的特点?对此,在经济学界认识仍然存有分歧。

1. 有人主张价格本来产生于商品交换和市场买卖双方的竞争,应当让价格恢复其本来面目,重新回到交换中去,在市场交换中形成。只有如此,才能使产品价格灵活地反映劳动耗费与供求关系的变化,为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比较准确的信号,以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外在的价格干预只会造成价格信号的失真。

2. 也有人主张社会主义市场价格是有控制和有管理的,不能自由放任。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价格和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价格肯定有不同之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控制市场价格的总水平,可以通过确定基础价格、最高价格和最低保护价格来控制市场价格的浮动幅度等。除了具有可控性特征以外,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也是垄断竞争的市场价格,既包括国家垄断、地方垄断,也包括行业垄断;还是有弹性的市场价格,无论是垄断性定价,还是自由价格都可以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进行自觉地调整或自发地浮动。

三、10年价格改革的反思

10年价格改革经历了二个阶段,1984年以前基本上是以“调”为主,着重调整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1984年下半年开始从调整价格体系推进到松动价格管理体制、转换价格模式这样更深层次的改革阶段,主要采取“放”的方式,放开几乎全部小商品的价格,放开了国营工业企业计划外生产的生产资料自销价格,从而使生产资料价格走上了“双轨制”的道路。采取以放为主的改革思路,导致价格水平上升较快,从1985年到1987年的三年间,我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年均上升7%以上,而1988年和1989年都接近20%,使我国经济陷入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境地,而在1984年以前的六年间,价格有升有降的调整,零售物价指数年均只上升2.7%。通过反思10年价格改革的进程,人们对价格改革在调整价格体系和转换价格管理模式方面都提出了一些看法。

1. 一种意见认为,保持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是价格改革顺利推进、走向良性循环的必要前提。1984年以前,比较重视价格稳定,蓄住了货币,从而使价格体系的调整进展顺利。而1984年以来,信贷、财政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不平衡,对通货膨胀采取了宽容态度,结果导致了价格改革的路子越走越窄。尤其是自1987年以后,企业甚至国家财政对价格改革的承受能力几乎都达到了边际水平;受严重通货膨胀的影响,人民群众有1/3左右实际生活水平负增长,人们已经把一度向往并热心支持的价格改革开始和“涨价”看作为同义语了,在心理上经不起涨价的风吹草动,使得自1987年以来,价格改革举步维艰,无法迈出实质性步伐,价格改革基本上陷于停滞状态。

2. 一种意见认为,在价格改革的方式上采取以调为主,还是以放为主,取决于其它配套措施的完善程度,尤其是国家宏观间接调控手段的成熟程度。物价基本稳定与价格体系的调整 and 价格模式的转换往往是

矛盾的。解决好这个矛盾的诀窍不在于矛盾的哪一个方面，而在于矛盾的外部因素，即其它改革措施，尤其是国家宏观间接调控能力的同步配套，如果国家宏观调控手段比较完善，可以有效地调节价格改革的外部环境，不会导致物价的大幅度上涨。1984年以前的第一阶段改革，宏观调控方式尚未转变，直接控制方式十分有效，1984年以后直接控制方式开始削弱，但间接控制方式未能相应发育，通过利率等杠杆调节货币发行量、调节投资需求尚未成为现实，而价格改革却又采取了以放为主的思路，结果是一放无羁，最终酿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而采取以调为主的方式，尽管其它配套措施不完善，但价格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本身仍然是可控的；价格一旦放开，自由价格就不再具有这样的功能。

3. 再有一种意见认为，价格改革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的步子既不能迈得太大，更不能铤而走险地“闯关”。我国目前企业经济效益不佳，并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难以根本改善，有效供给的根本好转无望，同时需求膨胀的势头又难以彻底压下来，因而不具备价格大步改革的经济环境。再说，企业和消费者都尚未成为娴熟的市场主体，大步改革价格后，并不能保证企业做出合理有效的反应，消费者也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反而会造成经济紊乱。如果一味蛮干，盲目“闯关”，就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甚至会葬送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

4. 在总结10年价格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人提出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改革价格体制的具体思路。如有人提出应实行“三·三”制改革，即：一是价格体制改革、企业产权改革和宏观调控体制改革“三管齐下”，同时进行；二是价格改革分小步、中步和大步三步分阶段推进（大步改革是10年以后的事情）。但三管齐下和三步推进，都必须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前提。也有人主张，深化价格改革要从改革财政、税收和金融体制入手，设法蓄住货币。其中主要包括运用货币政策实行货币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双管齐下，通过普遍提高利率水平、提高存款准备金和公开市场业务以及发展抵押贷款等手段实现货币总量控制，通过行政性的信贷指标控制和差别利率实现结构调整，改善经济环境；建立价格改革的补偿制度，不致使价格改革引起贫富差距拉得太大，在一定范围内做到社会公平，从而减轻价格改革的阻力。

通货膨胀的成因和治理

一、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

一年来，经济学界对我国通货膨胀成因的讨论，出现了如下几种观点：

1. 总量论。认为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过量供给。他们根据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原因不同而将通货膨胀分为外生型和内生型两种。我国近几年的通货膨胀基本上是一种内生型通货膨胀，即在资金流通系统内部，资金需求超过了现有的资金供给量，系统外的货币管理机构被动地以增加新货币来补足资金供需缺口而形成的通货膨胀。而所谓外生型是指，由于资金的商业循环的外部因素，要求货币管理机构向资金流通中增发过量货币而造成的通货膨胀。

2. 结构论。认为造成通货膨胀的表面原因是需求膨胀，深层原因则是需求增长结构不合理，进而加剧经济结构失衡，造成总供给能力相对不足。结构论者还认为，由于在国民收入日益分散化的过程中缺乏强有力的机制和政策，当它与以“双轨价格”、“承包制”为主要特征的双重体制合一时，几乎必然造成产业结构的失衡。

3. 体制论。有人认为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一种机制型通货膨胀。改革在打破传统体制造成的僵化落后局面的同时，也打破了传统体制的约束机制体系，即抵制通货膨胀的“免疫系统”。需求膨胀在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都找到了借以滋生发展的条件和机会，而且逐渐使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都成为需求膨胀的环节，最终导致财政金融的膨胀和货币发行量的膨胀。有人则认为产权界限模糊是导致初次分配中结构不合理的根本性因素。这一因素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及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需求膨胀的局面。如果我们的宏观政策不能有效地限制需求膨胀，那末它就会演变成现实的通货膨胀。也有人认为改革时期的通货膨胀有着特殊的原因和机制。它是在公有制和二元主权机制下，由国民收入的两种分配比例（初次分配和货币再分配）的差别，由计划者所要求的经济结构与劳动者所要求的经济结构的不相适应所引起的经济摩擦造成的，是一种“摩擦性通货膨胀”。

4. 政策失误论。认为我国通货膨胀之所以从1988年开始突破两位数, 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失误。表现为: (1) 对于经济形势判断的失误, 影响了前期确定的正确政策的贯彻; (2) 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倾向致使决策当局采取了一种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 (3) 对价格改革时机的不恰当的选择和宣传的失误, 导致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期的提高, 直至引发1988年的“抢购风”。

5. 预期论。认为1988年一般货币没有显著增长而物价出现明显上涨是由于通货膨胀预期所致。在1988年通货膨胀率18.5%中, 预期的影响约占8个百分点。

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效应

1. 一种观点认为, 在通货膨胀过程中, 国家可以增加资本积累, 社会各界生产建设投资会增加; 通货膨胀有优化资源配置效应, 能促进闲置资源的利用, 因而, 通货膨胀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2.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应彻底摒弃通货膨胀幻觉。(1) 从政府积累、企业积累、个人积累这三方面综合地看, 在我国, 通货膨胀并不能从总体上扩大资本积累。(2) 通货膨胀从总体上构建了卖方市场, 使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难以发挥, 从而保护了落后的生产者, 阻碍了技术进步; 而且通货膨胀时, 消费者行为扭曲, 给生产者以错误的信号, 致使生产者对资金的投向和投量作出错误的决策。因此, 通货膨胀对优化资源配置只有负效应, 这在目前“双轨制”下尤其明显, 因为它造成了价格信号的紊乱。(3) 通货膨胀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 也不能启动我国目前滞存的或闲置的生产要素, 因此, 通货膨胀不能促进经济成长。

3. 一些人通过计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 货币增长的加速虽然能够在短期内促进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提高, 但从长期看, 一次货币加速增长的最终后果是国民收入的减缩。从货币变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来看, 无论长期还是短期, 货币数量的加速扩张都导致了通货膨胀率的上升, 时间越长, 效果越显著。(2) 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不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降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一个因素, 因此, 不存在一条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3) 实际国民收入的加速增长必然伴随通货膨胀的恶化, 国民收入加速增长在短期内能够降低通货膨胀率, 但随收入增长而来的需求扩张将把通货膨胀推得更高。

三、治理通货膨胀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如何治理通货膨胀, 大体提出了三种基本思路。

1. 总量紧缩论。认为治理通货膨胀可从供求两个方面着手, 从长期看, 增加有效供给具有基本意义, 但从短期看, 有时压缩需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有时增加供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从当前来看, 第一位任务是压缩需求。还认为应当把产业结构调整寓于压缩总需求中。只有在总需求得到压缩的条件下, 长线产品和劣势企业才能得到压缩。坚持紧缩政策, 在短期困难之后, 就能迎来扎实的经济增长和有效供给的增加。

2. 结构调整论。认为应通过促进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优化来为总供求的大致平衡创造结构基础。为此, 需把紧缩政策和国民收入分配比例的调整结合起来, 适当增加中央掌握的资源的比重, 增强中央政府紧缩调控结构的能力, 增强对短线的投入, 缩小供求缺口。尽管从长远看, 应当坚定不移地进行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和价格体系的调整, 以创造出一个消除通货膨胀结构压力的体制基础, 但在中短期, 这种选择不可取。

3. 推进改革论。认为由于目前的双重体制的摩擦是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因此治理的基本思路应当是, 结合目前的紧缩, 对企业体制进行较大的改革, 用股份制取代承包制; 进行金融体制改革, 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及非金融资产, 将部分个人收入转化为生产和建设资金; 改财政大包干制为分税制, 消除地方投资扩张的动力。还认为, 在制度出了问题的情况下, 想绕过制度走是不行的。

至于治理通货膨胀的具体对策, 讨论中提出以下几点:

(1) 在治理通货膨胀问题上, 要克服急于求成的思想。

(2) 在金融政策上, 要树立大金融观念, 把所有的资金融通业务纳入货币政策的范围; 货币政策重心要从现金管理转向贷款管理, 重点解决信用膨胀; 结合产业政策调整信贷结构; 筹集专项资金, 用作农产品收购基金。

(3) 在金融体制上, 应进一步深化改革, 增加中央银行独立性, 赋予银行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建议中央银行从国务院独立出来划归人大常委会; 对地区人民银行实行完全的垂直领导, 分行行长

由总行任命,并定期轮换。地方政府不得干预地方所在银行的金融业务。

(4) 在财政政策上要通过税种的调整,提高财政占国民收入和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适当集中税权,实行分税制,减少税收优惠;实现财政平衡预算,一要增加财政收入,包括加强税收征管工作和增发国债,二要压缩行政事业费开支;将财政性建设资金变成政策性资金,即转为贴息资金。

(5) 在收入政策上,应健全企业约束机制,完善工效挂钩办法,使工资总额的增长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职工平均实际工资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使农民收入的增长在一般情况下不超过农村经济水平的增长;疏导收入流向,把一部分货币转化为相对稳定的非货币资产;拓宽居民消费领域,引导购买力分流。

(6) 在物价政策上,应实行价格控制的首长负责制;对消费品分别不同类型进行处理,对基本消费品统一价格,全国一价;对非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实行调节基金的办法,对高档消费品按市价销售;建立国家调控下的生产资料交易市场,让生产者获取涨价利益;整顿流通秩序,打击一切非法经营。

农业的发展与改革

我国农业在经历了1979年至1984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以后,1985年以来连续5年出现新的徘徊。对此,有人称之为“从超常规增长转向常规增长”,认为是正常的合理的阶段性变化;有人称之为“是农业周期波动”,这种农业周期波动,我国建国以来已出现7次,每个周期长度大致平均为5年;有人则称之为“停滞萎缩”、“困境”,甚至认为是“危机”;而有人又认为这种分析言过其实,整个农村经济从总体上说还是发展的,并未“停滞萎缩”,更未发生什么“危机”,只是粮、棉、油生产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

一、农业生产徘徊的根本原因

对于为什么粮、棉、油生产,特别是作为农产品大宗的粮食生产,出现了连续5年的徘徊,其根本原因是什么,人们认识有很大的分歧。

1. 一种观点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主观的失误。其主要论据是:(1)农业连续6年高速增长、特别是1984年大丰收,人们头脑开始发热,夸大了粮食虚假剩余的压力,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富裕程度,过高地估计了农业自身的发展能力,于是出台了一系列抑制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2)长期实行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强化发展重工业的倾斜发展战略,农业始终被放在服从于、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从属地位,对农业采取“歧视”、“剥夺”政策;(3)改革过热,生产关系进行重大调整之后,应当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改革并不能代替发展,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就是改革过热、发展不足;(4)由于人为的破坏,农业生产条件全面恶化,大大削弱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破坏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5)人们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神化,以为只要有了生产责任制,一切有关农业增长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6)农村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但一时间却把搞非农产业和乡镇企业当作主要任务,出现“十亿人民九亿商”,甚至出现依靠进口粮食来维持农村工业化的观点。

2. 另一种观点认为农业出现新的徘徊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在具体分析这种客观必然性时有如下一些论据:(1)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天赋资源严重稀缺的约束。从根本上看,当前农业危机的产生,实质上是资源利用已趋近于极限的必然反映,不是靠增强改革意识或发展意识所能解决的。中国将始终摆脱不了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中国的农产品供给尤其是粮食供给问题,只能着眼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对外贸易的国际转换来谋求真正解决。(2)由于客观的价值规律的作用,农民的机会成本与比较利益观念逐渐发育并强化,在比较利益悬殊的情况下,农民必然重工轻农、重流通轻生产;在土地产权不明条件下,也必然出现掠夺性经营的短期行为;由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猛涨,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经济效益下降,也必然影响其生产和投入的积极性;等等。应该说这些都是农民对价格信号反映灵敏的表现。(3)当前的农业问题是又一次的土地问题。在现有土地结构下,极有限的土地资源平均分配,农民除了自给性生产外,能拿到市场上去的农产品极为有限,因此失去种好地的经济动力。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一项生产一旦失去了经济动力,就非萎缩不可,带有必然性。(4)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处于低效益的产业位置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我国当前的农业危机,实质上正是孕育现代化阵痛中的必然产物,是加速经济增长与发展所必须支付的代价。在确切的意义上,农业危机不过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必然

存在的现象。因此,消除农业危机并不能主要寄希望于改革的不断突破。只有在工业化发展到相当水平,已经具备反哺农业的能力时,才有可能逐步加以解决。

3.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对农业问题必须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角度进行分析,要跳出从农业到农业、从农村到农村的框框,把农业和农村这个子系统放到整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去考察。粮食生产波动徘徊,归根到底是由于城市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造成的。由于工业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使得国家财政日益拮据,因此到1984年,中央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到了极限,原来掩盖着的许多矛盾突然爆发,直接导致了1985年的粮食大减产及以后几年的波动徘徊。有人认为,我国农业的危机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性短缺危机,是向新成长阶段转折时期结构性矛盾日益加剧条件下的供给的制度性短缺。有人则认为,从更完整和更全面的意义上讲,正是由于农村改革客观上存在的局限性,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这两种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我国农业持续徘徊不前的局面。

二、农业生产如何走出徘徊局面

对于农业如何走出徘徊局面,讨论中提出了从农业内部解决和从农业外部解决两种不同思路。

1. 一些人强调要使农业走出徘徊,必须从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着手,建立新的运行机制。具体意见有以下几点:(1)尊重价值规律的客观作用,解决现实存在的种植业内部以及农业与其他行业之间比较利益差距悬殊问题,使投入农业的社会必要劳动能够同投入其他行业的等量劳动获得大体相当的报酬,使农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获得大体相当的社会平均利润率,从而调动农民务农、特别是种粮的积极性,使农业对生产者和投资者具有吸引力,真正建立起农业自我发展、良性循环的机制,保证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价格是调节比较利益的基本手段,逐步形成符合价值规律的价格体系,是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但单纯靠价格完全放开,不能形成合理的比较利益关系,完全自动的价格调节也并不一定就是适度的调节。在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也不可能完全由市场供求来调节价格,而必须采取一系列综合政策措施,形成以价格为核心,财政、税收、金融、物资等经济手段相互配套的比较利益调节体系,才是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之策。(2)推进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实行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我国农村当前存在的土地制度只能适应传统农业的发展,而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现代农业是资金密集型农业,只有在较大的土地面积上,才能提高资金投入的密集度。只有土地制度的转变才能为发展现代农业铺平道路,使农业生产摆脱徘徊不前的局面。只有土地制度的转变,才能解决农业比较利益低的问题,使农民种粮有经济动力。因此,可以说土地问题不解决,价值规律的作用也会受到制约。(3)大力增加科技投入,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增加科技投入是农业发展的主动力,要使农业从徘徊中走出来,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问题,只有依靠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满足价值规律对农业生产的要求,也只有靠增加科技的投入,大幅度降低农产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大量增加务农收入。(4)农村组织创新。1985年以来,我国农业暴露出的危机,不仅仅表现为产量的徘徊和各种传统调控手段的失灵,而且在于经过10年改革,新体制仍未形成,新的经济秩序的运行机制远未完善。而农村新的商品经济体制要求有新的经济组织和新的组织方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组织的新思路应包括:第一,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影响农户,应成为总的农村发展方针;第二,大量发育农村企业组织,培育一大批新型农业企业;第三,将农户更多地导向企业化经营轨道。

2. 另外一些人则强调要使农业生产走出徘徊,光依靠农业内部的调整改革是无法办到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农业外,他们认为:(1)我国农业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农业和农村自身的问题,不如说是整个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要靠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靠迅速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没有非农各业和城市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就不能获得根本解决,农村土地——劳动力的比率就不可能提高,农业经营规模就不可能扩大,先进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广泛采用,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就会遇到根本性的限制,农业的商品生产和农业内部的积累能力就不可能迅速发展和提高,农村的自给性和封闭性就不可能减弱和消除,农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有机联系就不可能广泛发展,农民和农村就不可能富裕和繁荣。总之,农业和农村就不能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农业现代化就会遇到严重的、不可克服的结构性矛盾。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业面临的各种老大难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有赖于国民经济客观环境的改善和二元经济的转化成功,这将是一个复杂的艰巨的长期

过程。(2)有人认为,我国农业问题的实质,是我国现实的农业生产水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承担工业发展速度、国家建设规模和人民消费水平,归根结底是农业这个基础有多大承载能力的问题。农业问题集中反映在相对集中的工业与绝对分散的农业的矛盾,迅速发展的工业与缓慢发展(停滞徘徊)的农业的矛盾,现代化生产的工业与手工劳动的农业的矛盾。也就是说,在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工业及国民经济其它部门与农业商品生产落后之间的矛盾。因此,要使农业真正摆脱困境,必须从根本上调整工农业利益关系,改变重工业倾斜战略,执行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矫正长期以来国民收入分配的扭曲,矫正工农业发展的失衡。

3. 也有一些人认为,靠单味药方治不好中国农业的痼疾。只有在认清国情的基础上,采取配套改革和综合治理措施,从微观经济机制和宏观经济环境上进行改革,同时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指引下,用产业政策来指导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才能使农业保持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作者:光茂 宏亮 利民 林立)

1989年重要经济学术会议简介

企业家精神学术研讨会

时 间：1月3日~4日

地 点：香港 参加人数：50余人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主要议题：1.企业家的标准；2.企业家的精神；3.中国企业家的现状；4.企业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中美学者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研讨会

时 间：1月4日~7日

地 点：北京市 参加人数：23人

主办单位：劳动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引进办公厅和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主要议题：1.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2.关于控制通货膨胀；3.工资、物价的控制；4.税制改革与社会保险；5.工资与劳动力市场。

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10周年价格理论讨论会

时 间：1月10日~13日

地 点：哈尔滨市 参加人数：110余人

主办单位：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黑龙江省物价局和黑龙江省价格学会

主要议题：10年来价格改革的经验教训、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以及深化改革的思路。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学术讨论会

时 间：1月30日

地 点：北京市 参加人数：60余人

主办单位：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中青年农村经济研究会

主要议题：1.“规模经营”的含义及概念；2.规模经营的发展方向；3.实行农业适度经营的原则、形式和步骤；4.对规模经营的全面认识及其估价。

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研讨会

时 间：3月1日~2日

地 点：北京市 参加人数：90余人

主办单位：国家信息中心信息科学与应用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综合组、《人民日报》理论部、《经济日报》理论部、《经济学周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管理世界》、《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编辑部

主要议题：通货膨胀的成因和机理、预期滞胀和综合治理及研究中国通货膨胀的方法论。

世界经济前景预测研讨会

时 间：3月1日~3日

地 点：北京市

主办单位：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

主要议题：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及世界经济发展前景预测。

治理通货膨胀政策研讨会

时 间：3月10日~12日

地 点：北京市 参加人数：80余人

主办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主要议题：通货膨胀的成因和治理通货膨胀的思路及对策。

太平洋区域城市研讨会

时 间：3月10日~12日

地 点：上海市 参加人数：200余人

主办单位：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国际新城镇协会

主要议题：1.城市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2.城市发展与旧城改造问题；3.太平洋区域与世界经济技术的交流合作；4.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问题。沿海开放区经济活动人口变动与人口管理学术研讨会

时 间：3月21日

地 点：深圳市 参加人数：40余人

主办单位：中国人口学会、深圳大学人口研究所和深圳市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要议题：1.人口变动的基本概念、原因和作用；2.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关系；3.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问题；4.人口变动的管理与控制。

第五次全国行为科学学术讨论会

时 间：3月21日~23日

地 点：杭州市 参加人数：100余人

主办单位：中国行为科学学会

主要议题：1.学习讨论中共中央有关文件；2.开展社会行为研究的论述；3.如何运用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和现代管理科学等知识做人的工作；4.交流全国行为科学界近三年来研究的新成果。

全国横向经济理论讨论会

时 间：3月29日~4月2日

地 点：镇江市 参加人数：130余人

主办单位：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江苏省经济协作委员会、浙江省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

主要议题：1.回顾10年来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历程及其横向经济的含义；2.发展横向经济与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关系；3.关于横向经济组织机构的功能；4.发展横向经济的法律环境问题；5.横向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变化中的世界经济”国际讨论会

时 间: 4月12日~15日

地 点: 北京市 参加人数: 20余人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主要议题: 1. 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点; 2. 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 3. 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 4.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问题; 5. 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世界范围的改革浪潮。

国有企业的困境与前景讨论会

时 间: 4月18日

地 点: 北京市 参加人数: 50人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学科片

主要议题: 1. 国有企业的困境何在; 2. 陷入困境的原因剖析; 3. 国有企业的发展前景。

财税改革国际研讨会

时 间: 4月18日~25日

地 点: 北京市 参加人数: 30余人

主办单位: 财政部

主要议题: 1. 各国税制结构状况及税制改革的发展趋势; 2. 税收管理权限的划分和建立分级预算管理体制的状况; 3. 财政、税收政策的运用及其与经济政策诸方面的关系。

第八届国际物流会议

时 间: 4月25日~27日

地 点: 北京市 参加人数: 360人

主办单位: 中国物资经济学会

主要议题: 1. 物流的改革与发展; 2. 物流的系统化、一体化; 3. 提高物流质量及管理; 4. 物流国际化展望。

中国金融学会利率政策问题研讨会

时 间: 4月26日~29日

地 点: 郑州市 参加人数: 30余人

主办单位: 中国金融学会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会

主要议题: 1. 利率功能及政策问题; 2. 发挥利率杠杆作用所具备的条件。

中国企业财务研究会座谈会

时 间: 4月28日~29日

地 点: 北京市 参加人数: 30余人

主办单位: 中国企业财务研究会

主要议题: 1. 当前中国工业生产存在的问题、困难及对策; 2. 进一步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问题; 3.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

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讨会

时 间: 5月4日~6日

地 点: 北京市 参加人数: 80余人

主办单位: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主要议题: 1. 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及流动; 2.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途径。

全国中青年流通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

时 间: 5月6日~11日

地 点: 大庸市 参加人数: 50人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流通司等8个单位

主要议题: 1. 中国10年流通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2. 关于市场发育和组织; 3. 深化流通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 4. 对当前“治理整顿”的政策建议。

大企业(集团)研讨会

时 间: 5月8日~10日

地 点: 十堰市 参加人数: 近60人

主办单位: 中国工业经济协会

主要议题: 1. 改善宏观调控措施, 实行保护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政策; 2. 落实产业政策, 调整产业结构; 3. 建立和完善生产资料市场; 4. 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发展目标与技术改造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等问题。

中国农村金融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

时 间: 5月15日~19日

地 点: 上海市 参加人数: 170人

主办单位: 中国农村金融学会

主要议题: 1.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问题; 2. 农业银行的企业化经营; 3. 发挥农村金融在治理通货膨胀中的作用; 4. 农村资金问题。

统管社会商业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时 间: 5月16日~17日

地 点: 北京市 参加人数: 50余人

主办单位: 《经济日报》社理论部、商业部社会商业管理司和北京市商业管理干部学院

主要议题: 1. 探讨社会商业的概念和统管的对象、范畴; 2. 统管社会商业的内容和目标模式以及必要性; 3. 统管社会商业的问题和对策。

城市财政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时 间: 5月18日~23日

地 点: 上海市 参加人数: 22人

主办单位: 上海市财政科学研究所

主要议题: 1. 城市财政发展模式及其体制问题; 2. 缓解城市财政困境的出路。

全国治理整顿中的政府与企业行为理论研讨会

时 间: 5月18日~24日

地 点: 成都市 参加人数: 近100人

主办单位: 《城市改革与发展》杂志社、《中国城市导报》、上海城市经济学会、《长江开发报》、成都市西区人民政府等

主要议题: 1. 治理整顿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问题; 2. 政府行为与区际贸易摩擦问题; 3. 当前政府行为特点及规范化问题; 4. 企业行为矫正与政府行为的内在联系; 5. 建立新的政府运行机制问题。

财政金融政策与宏观调控——1989年中国国际学术会议

时 间: 5月19日~22日

地 点: 厦门市 参加人数: 50余人

主办单位：厦门大学

主要议题：1. 市场与政府：关于理论研究；2. 不同社会制度下宏观调控目标比较；3. 不同制度下财政税收与货币金融政策等主要宏观手段的研究；4. 宏观调控方法的发展及其对社会制度发展影响的比较；5.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政策与宏观调控；6. 西方运用市场机制的经验教训。

全国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研讨会

时间：5月23日~25日

地点：成都市 参加人数：30余人

主办单位：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分配体制司、国家计划委员会消费市场司

主要议题：消费的基本概念、消费需求膨胀及其原因和对策。

全国部分省市税收理论体系研讨会

时间：6月3日~8日

地点：黄山市 参加人数：30余人

主办单位：国家税务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主要议题：1.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税收理论体系的构建；2. 中国税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

粤港澳经济合作研讨会

时间：6月6日

地点：广州市 参加人数：40人

主办单位：全国暨广东港澳经济研究会，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

主要议题：1. 深化粤港澳经济合作的基础问题；2. 关于山区如何利用港澳优势加强合作的问题；3. 粤港澳经济合作中的问题及前景。

第三届中青年世界经济讨论会暨中青年亚太经济研究会

时间：6月30日~7月2日

地点：北京市 参加人数：60余人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主要议题：通货膨胀、债务与经济发展问题。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研讨会

时间：7月10日~13日

地点：长春市 参加人数：40余人

主办单位：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吉林省经团联、吉林省“美国学会”、吉林大学国际经济系

主要议题：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2. 金融资本的变化和特点；3.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的性质；4. 研究金融资本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

新时期中苏经济关系研讨会

时间：7月12日~15日

地点：海拉尔市 参加人数：40余人

主办单位：中国苏联东欧学会

主要议题：1. 新时期的中苏关系形势和苏联经济形势；2. 中苏经贸关系的发展潜力及其存在的问题；3. 关于进一步发展中苏经贸关系的设想和建议。

全国部分旅游地区首届财政理论研讨会

时间：7月12日~16日

地点：大庸市 参加人数：50余人

主要单位：甘肃省敦煌市财政局、海南省三亚市财政局、湖北省宜昌地区财政局、湖南省大庸市财政局、四川省成都市财政局

主要议题：1. 目前发展旅游事业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2. 发展旅游经济的作用及主要表现；3. 财政对旅游经济的反作用。

如何建立国家调控下的生产资料市场专题讨论会

时间：7月14日~15日

地点：北京市 参加人数：50余人

主办单位：《中国物资报》、物资部政策研究司、市场调节司、《光明日报》理论部

主要议题：1. 建立国家调控下的生产资料市场的必要性；2. 建立国家调控下的生产资料市场的思路；3. 国家如何调控生产资料市场。

全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立法问题理论研讨会

时间：7月26日~30日

地点：石家庄市 参加人数：60余人

主办单位：国务院法制局、轻工部、商业部、全国城镇集体经济研究会

主要议题：1. 关于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本质特征和法律概念；2. 关于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财产关系和产权界定；3. 关于集体企业的内部管理体制；4. 关于集体企业的分配问题；5. 关于集体企业与联社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全国经济技术协作机构功能研讨会

时间：7月26日~31日

地点：秦皇岛市 参加人数：147人

主办单位：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横向经济研究会、秦皇岛市经济协作办公室

主要议题：1. 经济技术协作机构的功能；2. 交流工作经验和协作信息；3. 横向经济研究会的组织建设工作。

华北地区第四次货币流通研讨会

时间：7月31日~8月3日

地点：呼和浩特市 参加人数：30余人

主办单位：华北五省、市、区金融学会，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主要议题：1. 华北地区1988年及1989年上半年货币流通形势分析及1989年预测；2. 严格控制货币投放，增加货币回笼、稳定金融的对策与建议。

东北三省第九次物资经济理论讨论会

时间：8月1日~4日

地点：鞍山市 参加人数：69人

主办单位：中国物资经济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及东北三省的部分高校

主要议题：1. 目前中国生产资料市场现状的分析；2. 培育和发展生产资料市场的设想；3. 建立国家调控下生产资料市场的探索；4.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思考。

第三次全国企业财务理论研讨会

时 间: 8月3日~6日

地 点: 浑江市 参加人数: 50余人

主办单位: 中国企业财务理论研究会

主要议题: 企业财务改革理论和实践的回顾与反思。

全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

时 间: 8月5日~11日

地 点: 宁夏(永宁县) 参加人数: 70余人

主办单位: 全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

主要议题: 1. 农业技术经济效益评价工作研究; 2. 开发性农业问题; 3. 农业技术进步测度的理论方法; 4. 农业技术经济面临的新任务等。

信息经济学研讨会

时 间: 8月8日~10日

地 点: 北京市 参加人数: 90余人

主办单位: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

主要议题: 1. 经济信息的有关问题; 2. 关于信息经济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3. 关于信息产业; 4. 关于信息商品化问题。

预测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时 间: 8月10日~15日

地 点: 黄山市 参加人数: 近100人

主办单位: 合肥工业大学预测与发展研究所、

《预测》编辑部

主要议题: 如何加强预测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工作。

中国城市生态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研讨会

时 间: 8月15日~19日

地 点: 承德市 参加人数: 77人

主办单位: 中国城市生态经济研究会、《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编辑部、承德市人民政府

主要议题: 城市生态和经济两者之间如何协调发展。

煤炭企业优化劳动组合研讨会

时 间: 8月20日~23日

地 点: 日照市 参加人数: 69人

主办单位: 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劳资部、《煤炭经济研究》编辑部、山东兖州矿务局

主要议题: 煤炭企业优化劳动组合的理论依据、特点、必要性以及有效作法、标准和配套改革政策。

华北、华东地区大企业(集团)座谈会

时 间: 8月20~24日、9月17~21日、10月17日~19日

地 点: 北京市、鞍山市、嘉兴市

参加人数: 50~60人

主办单位: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

主要议题: 探讨如何搞活大中型国营企业的问题。

中国城市化道路研讨会

时 间: 8月21日~25日

地 点: 大连市 参加人数: 68人

主办单位: 东北财经大学城市发展与改革研究会、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上海城市经济学会、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等20个单位

主要议题: 1. 城市化的一般理论; 2. 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经验和现状分析; 3. 关于中国城市化宏观战略的方针; 4. 关于城市化的体制和政策。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

时 间: 8月22日~30日

地 点: 呼和浩特市 参加人数: 50余人

主办单位: 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中国人与生物圈计划国家委员会、内蒙古大学、内蒙古林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

主要议题: 1. 干旱区自然资源与利用; 2. 土地沙漠化与环境整治; 3. 区域开发与绿洲建设; 4. 干旱区土地人口承载能力与人口控制等问题。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座谈会

时 间: 9月1日

地 点: 北京市 参加人数: 40余人

主办单位: 北京市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会

主要议题: 1. 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 鼓吹私有化的种种表现; 2. 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3. 强调辩证法, 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学习。

生产资料市场发展战略研讨会

时 间: 9月5日~8日

地 点: 北京市 参加人数: 30余人

主办单位: 物资部政策研究司

主要议题: 新形势下深化物资体制改革和发展生产资料市场的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系列讨论会

时 间: 9月7日

地 点: 上海市 参加人数: 40余人

主办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主要议题: 1. 10年来经济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突破和进展; 2. 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和不足之处; 3. 对一些经济理论、观点的不同看法。

中国煤炭城市发展联合促进会首届年会

时 间: 9月11日~14日

地 点: 大同市 参加人数: 220余人

主办单位: 中国煤炭城市发展联合促进会

主要议题: 结合煤炭城市的特点, 合理调整产业结构问题。

“开辟西部通道”学术讨论会

时 间: 9月11日~15日

地 点: 银川市 参加人数: 80余人

主办单位: 宁夏自治区经济研究中心、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自治区党委研究室

主要议题: 1. 西北地区开辟西部通道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 2. 西北地区开辟西部通道的经济发展战略; 3. 西北地区与中东、苏欧国家的经济贸

易形式;4.对外开放中西北各省区的经济利益问题;
5.开辟西部通道的对策。

搞活大型骨干企业对策研讨会

时 间: 9月12日~14日

地 点: 北京市 参加人数: 110人

主办单位: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都企业家俱乐部和首都钢铁公司

主要议题: 完善承包制搞活大中型企业的途径以及推行税制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等问题。

全国住宅小区管理经验交流会

时 间: 9月13日~16日

地 点: 大庆市 参加人数: 150余人

主办单位: 城乡建设部

主要议题: 1.交流全国城市住宅小区的管理经验; 2.小区开发与创建新的管理模式。

第三世界研究中心举行第一次学术讨论会

时 间: 9月15日

地 点: 北京市 参加人数: 30余人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主要议题: 1.发展中国家国营企业的作用及其私有化的原因; 2.发展中国家工业与农业的关系、资金与生产要素的关系; 3.对传统发展理论的吸收和批判。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企业分会第五次学术研讨会暨理事

时 间: 9月16日~18日

地 点: 杭州市 参加人数: 50余人

主办单位: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

主要议题: 就企业数量经济学的研究趋向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的有关问题并结合提交会议的学术论文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亚太经济合作研讨会

时 间: 9月18日~21日

地 点: 北京市 参加人数: 70余人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首钢国际问题研究所

主要议题: 近两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区域化和亚太经济合作的研究成果。

金融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

时 间: 9月20日~24日

地 点: 邯郸市 参加人数: 30余人

主办单位: 中国金融学会

主要议题: 1.中国10年来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评价; 2.金融宏观调控问题; 3.关于金融机构的竞争问题; 4.关于专业银行企业化问题。

中国大型企业发展问题座谈会

时 间: 9月21日~23日

地 点: 北京市 参加人数: 200余人

主办单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主要议题: 1.企业资金短缺及三角债务关系;

2.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3.企业经营形式。

中国农民企业家研究会第三次学术会议

时 间: 10月8日~12日

地 点: 北戴河 参加人数: 170人

主办单位: 中国农民企业家研究会和《农业经济问题》编辑部

主要议题: 1.治理整顿中乡镇企业的发展问题; 2.乡镇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如何走出困境; 3.对农民企业家作用的再认识。

全国性工业行业协会经验交流会

时 间: 10月9日~10日

地 点: 北京市 参加人数: 120人

主办单位: 中国工业经济协会

主要议题: 工业行业管理协会开展工作的情况交流。

全国供销社企业管理研讨会

时 间: 10月9日~12日

地 点: 吉林市 参加人数: 37人

主办单位: 中国供销合作经济学会

主要议题: 1.改革与完善供销社企业经营体制; 2.探讨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供销合作社企业途径; 3.如何当好供销合作社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首次城建经济学术研讨会

时 间: 10月10日~14日

地 点: 阜新市 参加人数: 32人

主办单位: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主要议题: 1.城市发展的适度规模的评估与控制对策; 2.城市建设经济投入与产出问题; 3.城市结构与功能的协调以及各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4.住宅商品化、私有化问题; 5.关于城市经济运行的优化组合; 6.城市发展模式选择、土地规划开发及其城市改造和城市建设资金建立良性循环的条件。

全国第三届小城市经济社会问题研讨会

时 间: 10月13日~16日

地 点: 老河口市 参加人数: 309人

主办单位: 全国小城市发展促进会

主要议题: 小城市发展战略、治理整顿中谋求发展问题, 以及小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全国区域发展战略理论与方法研讨会

时 间: 10月13日~17日

地 点: 杭州市 参加人数: 54人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主要议题: 1.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研究阶段及其主要特征; 2.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指导思想; 3.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研究方法; 4.当前的区域发展战略研究。

政府行政管理改革国际研讨会

时 间: 10月16日~20日

地 点: 北京市 参加人数: 50余人

主办单位: 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和人事部